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大迁移、大转折的关头，在党和革命十分危急的时刻，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停办，党校教员跟随红军主力长征。此后一直到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进驻延安的这两年多时间里，长征中的党校饱经战火洗礼，历经整编、停办、复校和动迁等多次调整，但党始终没有放松依托党校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体党校教员紧紧跟随在党中央身边，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讲台随着长征行，把理论放在战火硝烟中检验，当好忠诚于党、人民放心的“布道者”和“熔炉工”。

跟着党走，不能掉队。党校自创立初期就提出“教育培训一定要服务于组织的目标。提高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纯洁党的思想和组织”。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校教员就是这一重要任务的直接执行者。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陕北瓦窑堡不久，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正式定名“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当时中央党校只有三个班。成仿吾是教务主任、高级班的班主任和政治常识课教员。另两个班的班主任是习仲勋和冯雪峰。成仿吾深知方向凝聚力量的重要性，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校教员的天职，越是战时越不能掉队。他坚持发挥在苏区时期党校讲政治常识课的优势，第一时间设计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世界政治、各派哲学等理论课，又因地制宜开设了苏维埃建设、群众工作、军事游击战争、拼音文字、算术等实操课。“党旗飘到哪，咱就跑到哪。”艰苦卓绝的长征让党校教员的心与党贴得更紧，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更加

在战火硝烟中检验理论

——记长征中的党校讲台

□ 王子惠 朱一华

坚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交谈和讲课，党校教员们摆事实、讲道理，跟着党“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这样静悄悄地长征队伍中有了惊人发展。从1935年11月复校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长征宣告结束这段时期，党校培训的学员也大量增加。有从山西带回来的青年几百人，编为青年班；有在长征途中动员来的少数民族青年，编为少数民族班；还开办了高级班，培训陕北苏区的县委书记、县长等。党校教员承担的授课也跟着丰富起来。成仿吾讲《政治常识》，李维汉讲《党的建设》，董必武讲《苏维埃建设》，张云逸、罗炳辉、赖传珠等讲《游击战争》。长征检验了党校，党校教员既是育人者也是被育者。通过长征，党校教员和学员一道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脚印不掉队，把课堂放在祖国大地上，把讲台向长征战场延伸，心灵得到涤荡、思想受到洗礼、精神得到升华，在艰难困苦的转战跋涉中，党校和党校教员的作用也得到了全党的更加认可。

党员带头，干部先上。长征时期，在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红一方面军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红军干部、知识分子和留俄学生较多，这些党员和干部大多经历过严峻的革命锻炼和组织考验，多在苏区时期党校上

过课，担任过党校的兼职教员，有很高的革命觉悟，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丰富，成为长征时期到党校讲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和党校教员一起宣传鼓动、并肩战斗，在改造红军将士主观世界上发挥了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示范引领作用。红军长征中，组织上给大部分党校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教员、学员、干部和军事院校人员合并编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何长工（原红军大学校长）任军委纵队干部连连长，徐特立、成仿吾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在极端残酷的斗争环境下，在异常艰难的行军途中，讲台就是战场，教员就是战士，只有抓住行军路上和宿营间隙的时间讲政治课。在这支红色的党校教员队伍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长征四老”。他们是红军队伍中四位德高望重、鼎鼎有名的老同志：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参加长征时已经57岁，他不但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课，还教战士们识字读书，带给战士们知识的营养和学习的乐趣。董必武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还出任中央纵队总卫生部卫生支队妇女队的“胡子队长”，经常化繁为简宣传党的政策，还编唱了一首《担架歌》：“担架担架，既担又架。巾帼好英雄，须眉也认下”。谢觉哉和林伯渠处处以身作则，宣传红

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与官兵同甘共苦，给年轻的红军战士以极大的鼓舞。成仿吾在苏区时期党校的讲课就很受欢迎，他善于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把有关图书、资料中的插图找出来，自己绘图并编排，用形象的画面说明人类进化过程，并进行展览，以达到教学效果。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陕北瓦窑堡复校后，他给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这些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以身作则化身为“党校教员”，极大丰富了党校讲台的政治教学，壮大了党校教员队伍，生动实现了党校“教干部、干部教”的良性循环。

坚持真理，传播“火种”。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学风，也是党校教育的基本方针。冯雪峰作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是中国文艺界为数不多的走完长征的“文化人”之一，也是“左联”成员中唯一参加长征的人，被称为党中央和鲁迅之间联系的纽带，更是一名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优秀党校教员。他曾担任过中央苏区时期党校教务长、副校长，后来以红九军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的身份参加了长征，由于他的文化理论水平高，先后担任了上级干部队政治教员和红军大学高级教员，跟随在中央的周围。长征途中，冯雪峰与战士们

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啃树皮、吃草根，与敌人英勇斗争。在战斗的间隙里，他把战场当作教室，给战士们讲革命道理、为战士们鼓励加油，通过沿途了解群众的风俗习惯，调查当地的社会情况，在群众中传播马列真理、播撒革命种子。随着长征的深入，他愈加感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毛泽东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正确英明，他向红军战士作出及时的政治宣传，教育红军战士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正是因为有一批像冯雪峰这样的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学用结合和正确政治方向的党校教员，既服从于、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同时践行了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有力地推进了长征时期党内监督和党的建设。

步调一致，夺取胜利。长征是一首斗争磨砺、血战到底的誓词，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描述了这个磨砺的过程：“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改造了党校，更激励警醒党校教员时刻与党保

持步调一致、同频共振。由于长征途中的生活、工作和斗争异常艰苦、繁重和复杂，一些意志薄弱的干部战士经不起风浪考验，出现了思想动摇和开小差的现象。面对非战斗减员的情况和加强“扩红”的现实紧迫任务，破除教条主义带来的路线混乱危害，也成为长征时期党校教员干部教育必须解决的重大命题。1936年初，中央为培训东征干部，在刚刚复办的中央党校举办三个突击班。林伯渠在参加长征时，先是担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以红军领导身份多次到党校授课。他结合行军案例提出问题，大量引用毛泽东的教导，认可宣传践行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特别是在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关键问题上向红军作出科学的阐释和合理的解释。也恰如在课堂上划着一根火柴，用它点燃了学员们心中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承理念的敬仰和追求的火焰，更为宣传鼓动沿途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传播了革命的火种。1936年10月，洛甫发表《关于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论干部教育问题》一文，提出“活的身动的具体的榜样，是教育自己干部的最好方法”。正是有这样一批活的生动的具体的党校教员，与党时刻保持步调一致，为夺取革命事业胜利打气加油、摇旗呐喊，也成了长征时期一支不应被遗忘、跟党走越走越壮大的特殊队伍。

党校红色记忆

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 马亚敏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即在于能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历经数千年洗练与淘漉后沉淀下来的优秀而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是中华文明久远的回响，是沉淀凝结在人们心底恒久的精神传统，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精神支柱。

作为民族精神与智慧的集中表达与展示，传统文化资源既涵盖了传统建筑、传统工艺品等众多的物质传统文化资源，同时涵盖了思想艺术、风俗节庆等异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一方面，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符号元素可以被视为可供经济发展的产品或为之服务的“资本”，通过多种形式的转化后能够形成可观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从国家和社会发展视角来看，传统文化资源始终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力量。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现代性转化，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中承载的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予以确认和保留，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无论从哪种视角出发，传统文化资源都是当前繁荣文化事业、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性资源”，需要我们“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

“创意活化”激发传统文化转化新方式

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本质上是一种创意转化。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键是运用现代创意，从风俗、节庆、技艺、图案、木石、金属等一切传统元素和传统符号中寻找灵感，创新传统文化表达形式，创造出形式新颖、创意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又有强大吸引力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期待。例如，在2019年，取材于神话故事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被称为“国产动漫崛起的代表作”，无论是影片画面中呈现出的山河社稷，还是贯穿其中的善恶有道、阴阳消长等传统思想，无不显示出传统文化资源的不朽魅力与时代价值。

除动画外，一些当代艺术家也善于从历史故事、汉字书法、民间剪纸、园林建筑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创作源泉，运用新型创意与娴熟的艺术创作手段，打造出独具时代特色、凸显个性化与本土化的艺术作品。既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资源，弘扬了民族文化，也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拓展出新空间。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就必须主动运用创意，激活传统文化资源中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通过再审视、再阐述、再运用和再创造，找到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最佳契合点，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数字活化”拓宽传统文化传承新空间

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优势资本以新的方式呈现是当前语境下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成为传统文化资源现代性转化的良好载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8.5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科技赋能，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数字技术加速结合。一方面，数字技术的突出优势有助于加快传统文化传播速度，扩大传统文化传播范围，有效解决传统文化资源的存在方式与公众接受方式之间的矛盾，增进公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数字活化思维”有助于塑造崭新文化形态，拓宽当下时代下传统文化传承与转化的新话语空间。例如，敦煌研究院曾携手腾讯新闻文创，在微信上推出了一款在线制作丝巾的“敦煌诗巾”小程序。程序以高踞敦煌石窟顶部的藻井为灵感来源，融入了藻井多样的纹饰和庄严肃丽的敦煌壁画，用户只需选定主题，再从200多个元素和8种底色中进行任意选择和搭配，就能定制出一款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敦煌丝巾。由于满载了远古敦煌的文化魅力又极具演绎空间，小程序上线当天即有6万人次参与DIY创作，远超莫高窟每日接待的游客数量，很好地完成了品牌传播和引流转化。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虚拟性、整合性、互动性、娱乐性等特点，打造具有沉浸性与趣味性的文化体验，促进传统文化资源加速向数字化媒介转化，成为数字人文时代传统文化



数字文创产品——“敦煌诗巾”

资源实现现代性转化的必然趋势。

“跨界活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

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本身即是传统与现代的一次跨界。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跨时空、跨领域、跨观念的活化利用，使传统文化资源获得更加多样化的存在形式，同时也使得当代设计更具有传统文化的智慧与神韵。这就需要我们突破传统文化资源的固有形式，拓展资源转化的范围，优化传承方法，通过跨界合作的方式，多方面寻求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生活的相通之处，最终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从理念到形式的深度结合。

目前，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历史文化遗产地的文化保护单位开始依托自身独有的影响力与资源，设计开发文创产品，在满足大众社会需求的同时，完成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设计语言转化，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日常生活场景的双向融入。例如，为纪念紫禁城建城600年，故宫推出了“闪耀星河”系列彩妆，其灵感正是来源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座“日月星晷仪”。无论是腰红的独特钟表压盘设计，还是“宫墙”“将夜”等口红色号，都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

既增添了丰富的文化韵味，也为故宫赚足了人气。一些国产服装品牌也以故宫为主题打造系列时装，从清朝传统服饰中汲取灵感，将宫廷线绣工艺、烟雨江南纹样等古代宫廷元素与现代时尚成功结合，引发了巨大关注。这些都成为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性资源跨界碰撞的优秀范例。由此可见，现代语境下，传统文化资源要获得时代生机与活力，就不能依靠单纯的静态保护，而应当用当代审美、当代价值观对其进行二次升华，通过跨界联合的思维创造，同现实生活中不断发展的、多种多样的文化需求有效对接，创造出历史感与时尚感并重、知识性与实用性兼顾的新文化产品，从而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生命，实现传统文化的多角度延伸。

作为悠久宏大的历史积淀，传统文化蕴含着数不清的资源与巨大的时代价值，通过加强创意设计、充分利用数字载体、寻求跨界合作路径等抓手，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沛的文化动能，滋养当代人的心灵，坚定文化自信。伴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帆远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必将潮平岸阔。



垂钓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篇章。历代喜爱垂钓的人数不胜数，有以渔为生的市井百姓，有寄情山水的文人墨客，有淡泊明志的隐逸高人，有身居显要的达官贵人。这里面对钓鱼不当谋生手段，而当作精神层面追求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志不在鱼”。唐代岑参《渔夫》一诗中写道：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五代词人李珣《渔父歌》述道：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对这些人来讲，垂钓是一种情怀。

垂钓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指向，历代文人们常借用渔翁垂钓这一常见的生活景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渔、鱼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鱼既是古人自身形象的代言，也是古人所渴望的休闲生活的具象。鱼既是文人观照自我、表现自我的媒介，也是他们进行哲学思辨的依凭。文人习惯把垂钓当作一种精神寄托，竿一线一弯钩，寄托了他们实现自身价值和抱负的追求。

隐士文化也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隐者形象极为丰富，尤以“渔翁”最为著名。“渔樵耕读”这四大隐逸形象中，“渔翁”居其首。渔翁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垂钓于清溪之上，寄情于清风徐来里，笑傲于一苇横江中，看轻名利，乐山爱水，生活清雅、高古、洒脱，体现了一种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理想，一种归隐的倾向，是古代隐士的标准像。在文学作品中，渔翁也常被描绘为隐士高人，成为隐者的代名词。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在我国古代，文人仕途不如意时，往往寄情渔樵，侣鱼虾而友麋鹿。

古代渔翁形象的隐士很多，先秦的庄子就是著名的隐士。这类隐士虽然才华横溢，却醉心山水，不愿入仕为官。如在《庄子钓于濮水》一文中，楚王派遣两位大夫聘请庄子入仕辅佐楚王，但庄子淡泊名利，宁愿“曳尾于涂中”，终老于山林，也不去楚国为官。对于庄子而言，鱼同样也是思辨的媒介，鱼作为阴阳两极的象征，具有哲学思考的意义。古代由鱼而引发的思辨，最著名的就是庄子与惠施的“子非鱼之辩”，他们通过鱼来阐发各自的哲理。

古代渔翁隐士中，固然不乏庄子那样的真隐士，而像姜太公那样以隐求仕的也不在少数。商周之际，隐居

渔翁在隐不在鱼

□ 段培华



于渭水之畔的姜太公喜爱垂钓，不过，他却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钓的不是鱼而是人。春秋战国时期的宋玉在其《钓赋》中将钓鱼引申为钓天下。王曰：“子之所谓善钓者何？”王曰：“臣所谓善钓者，其竿非竹，其纶非丝，其钩非针，其饵非蚋也。”王曰：“愿遂闻之。”王对曰：“昔尧、舜、汤、禹之钓也，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钓道微矣，非圣人其孰能察之？”他认为，治理天下的道理和垂钓的智慧是相通的。在古代中国，这一类隐士多是“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他们“处江湖之远”却心忧庙堂，往往采取以隐待仕的方式，以期走终南捷径以平步青云，实现自己的理想。

古今同为渔，意义不相似。无论是庄子的真隐还是姜太公的以隐待仕，他们都不是纯粹的渔翁，而是借鱼抒怀，以鱼言志。

